

# 人生難得的機遇

羅覃 Thomas Lawton 文  
林品樺 譯

有時候莊尚嚴先生會來拜訪我們辦公室，他和那志良先生、江兆申先生與傅申先生四位會一塊兒討論精妙的畫風、各種絹或紙的優點、鈐印擺放的位置以及各種裝裱的方式；對我而言，像是參加一場教授們的中國藝術傳統鑑賞討論會。我會安靜地聆聽並且在一旁學習。

一九六三年秋天，當我抵達臺灣的時候，身為傅爾布萊特獎學金 (Fulbright Fellow) 得主，我有兩項主要目標，一個是在台灣大學內的史丹佛語言中心加強中文能力，一個是完成我在哈佛研究所博士論文相關的研究。若未有那一九六三年的最後數月，我就不可能花了四年，與故宮的工作人員如此密切地一道工作。回憶過往，我明白那四年對我日後在佛利爾美術館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工作至為關鍵。當在思考館內決定，或是討

論中國器物的時候，我便十分感謝那些我曾在故宮受過的訓練，使我能夠做出判斷。

一、  
一九六三年的時候，那些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間從上海運到臺灣的故宮藏品，仍暫時安置在北溝，那是個位在台中市郊的小村子，溫濕度非常適宜保護與保存脆弱古物。放置藏品的地方是個又冷又乾的洞穴，可以提供額外的保護。

當我在台灣時，故宮正在進

行繪畫的拍攝工作。每天，繪畫負責的人員，拆開堅固的金屬框木箱子，將藏品取出到附近大樓的拍照室，在那裡工作人員小心地打開畫卷，將之放在大的畫架上好方便拍照。在這個精密的過程內，會有些許片刻讓一旁求知若渴的觀者，討論筆法、鈐印和跋文。對中國繪畫有興趣的人來說，這都是非常難得且光榮的機會。從攝影師臉上的表情可以推測，他常常習於必須有自制力不被觀眾打擾，例如我，時常妨礙到他的工作一樣。雖然在拍攝計



北溝庫房工作一景。

畫期間，只能搭火車從台北到台中，看一些畫卷一兩次，但這樣的經驗就像是打開一座大寶藏的蓋子，並且終於能夠抓住瞥見這些珍貴內容的機會。

同樣重要的機緣是遇見莊尙嚴（一八九九～一九八〇）先生，那時他是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另外還有遇見那志良（一九〇七～一九九八）、李霖燦（一九一三～一九九九）兩位研究員。對於那先生的書我很熟悉，



民國五十四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落成於台北市外雙溪現址。

尤其是那本在一九五七年發行的《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他詳列一九二五年當時北京故宮成立的環境，他生動地報告搬遷藏品到上海與南京，以及之後到中國西南的經過，以一個從開始就參與的人員角度，提供博物院歷史的全景描述。那先生隨後又在「一九六六年發表《故宮四十年》」，提出更多對於故宮歷史的

觀察。雖然日後有許多人寫過故宮的歷史，但我始終認為那先生的兩本書提供了最可靠與完整的資料。可惜的是這兩本書未能有英譯本，或是其他語言的譯本，以饗其他讀者。

二、

一九六一年初政府開始計畫興建中山博物院（Chung-shan

(Museum)，這是一棟巨大有著傳統中國風格的建築物，能夠更容易、更恰當地放置故宮的藏品。新的博物院院址選定在外雙溪，在一個安靜又綠意盎然的台北郊區，十分理想；而這個計畫同時也標示著，那些清朝皇帝所收藏聞名世界的中國古物，即將開啓新一章歷史。

在此同時院方決定發行雙語並附有插圖的觀眾手冊，管理委員會的何聯奎先生問我是否有興趣做英文翻譯，我十分願意參與任何與新博物院有關的計畫，因此很快便答應了。接下來的幾週，我集中心力翻譯手冊中的每個段落與插圖的解釋。之後何先生再與院內其他研究員討論我的翻譯，我很放心地學習，因為研究員會加強我的翻譯，當計畫持續進行，我們也日益瞭解彼此。

外雙溪的新博物院開幕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也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百年誕辰紀念日。當日子漸漸逼近，院方討論是否需要雙語的說明牌以及



一九六五年，那志良先生。作者攝

展示用的雙語說明文字。因此何先生又再次詢問我是否願意做英文翻譯，那時被指派的新院長蔣復璁先生，十分慷慨地認為應該讓我有一個「顧問」的頭銜，如此可以正式地在新博物院上班。這是此生僅有的一次機會，我欣然允諾。然而我必須得到傅爾布萊特獎台北代表處的同意，最後很幸運地，因著我的熱忱，還有我極盡詳細地陳述故宮的工作對於我做博士論文主題的研究的幫助，所以傅爾布萊特獎學金那邊的人，認為我應該接受蔣先生的

邀請。

接著要面臨的問題是，我應該在新博物院的哪個單位任職？經過研究員們謹慎的討論，最後認為我應該到那志良先生負責的書畫處工作。那是個又大又明亮的辦公室，裡面還有其他的員工，就在那先生的辦公室隔壁。其他一道工作的還有江兆申（一九二五～一九九六）先生、傅申（一九二七～）先生以及史凌雲女士。江兆申先生是薄心畬（一八九六～一九六三）的學生，他自己同樣也是知名的畫家與書法家。另一位年輕的傅申先生，則是一位被看好的學者與書法家。

為了有效利用空間，我們將四張桌子組成一塊四方形的區域，江兆申與傅申坐旁邊，而我與史女士坐另外兩頭。會如此安排是有一套邏輯的，因為江兆申是那先生的助手，而傅申是第二順位。史凌雲在美國讀藝術史，有著很好的英文能力，所以十分有資格檢查我的翻譯是否確實，上面不能有明顯的錯誤。與這些



一九六五年，江兆申先生。作者攝

能幹的同事一同工作，我會跟我朋友開玩笑說，我在辦公室的地位就像是「圖騰柱上的最低之人（low man on the totem pole）。」

主要因為那先生與江兆申溫文儒雅的個性，每位在書畫處工作的人都相處融洽，那先生會與江兆申討論展覽的計畫，江兆申之後就會開始選件。我曾看過一些書法及繪畫的藏品，那些都會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間在美國的城市展示過，是由中華民國政府策劃的展覽中一部份。但絕大多數的藏品都是我從《故宮書畫錄》、《故宮週刊》上的插圖讀到的。因此當我在做展覽的藝術品研究，邊看邊聽的時候，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啟發——用這些世界著名的、有價值的參考依據——可以在辦公室裡頭研究。

許多故宮畫卷的外面都有特殊絲織品封套，這是清代所製，封套的一邊會寫上畫家的名字以及畫名，常常還會有這幅畫的評價，例如「妙品」或「神品」。負責畫卷的同事說這是畫

的衣服，起初我以為這是一種幽默的說法，後來我漸漸瞭解那個名字可能會被每一代的收藏家所承襲，這是中國鑑賞傳統的一個部分。有時候莊先生會來拜訪我們辦公室，特別的是，他來的時候會加入我們畫卷的討論，詳細地檢視。莊先生與那先生都是在北京長大，他們有著一口優雅的北方口音，當我聽著他們的談話，我十分感謝在史丹佛語言中心的老師，曾經很努力教我模仿北京腔。莊先生、那先生、江兆申與傅申會四位一塊兒討論精妙的畫風，各種絹或紙的優點，鈐印擺放的位置以及各種裝裱的方式；對我而言，像是參加一場教授的中國藝術傳統鑑賞討論會。我會安靜地聆聽並且在一旁學習。

### 三、

每一次特展的畫卷選件決定後，江兆申與傅申就會一同寫中文的文字說明。每天我們都在一九六五出版的《故宮書畫錄》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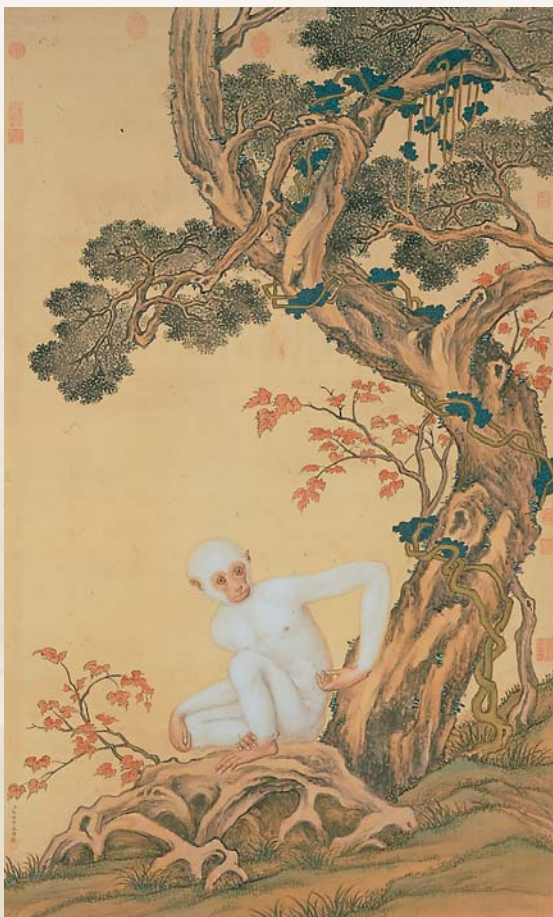
訂本尋找參考資料，一套四本，是根據清代宮中目錄《石渠寶笈》所編成。我對於江兆申文字的要求十分欽佩，有天他在翻閱《故宮書畫錄》，他忽然有些驚訝地說：「這些印出來的字恐怕有些錯了。」接著他要求調閱相關清代原始的版本，也就是《石渠寶笈》，這本書必須從庫房中提出。這是個難得的經驗可以見到這本書，用毛筆書寫在極好的紙上，被裝入絲製的盒內，這是中國皇室收藏鑑賞的精緻範例。在江兆申檢查過手寫的《石渠寶笈》後，他笑了笑接著說：「對，在複印的一九六五年版本上面有一些錯誤。」

江兆申與傅申完成中文文字說明後，就會交給我翻譯。同樣因為江兆申與傅申都是優秀的書法家，所以能夠閱讀這些說明文字非常榮幸。然而，找尋能夠與這些有條理的中文同義的英文字，是極大的挑戰。幸運的是，史凌雲可以仔細地幫我校閱翻譯，指出有些離意的片段。相反

地，當江先生與傅先生在揮毫時，有種不被打擾的安靜會佔據整個辦公室，我準備翻譯英文而在使用打字機時的聲音，會侵入整個沈靜氣氛的辦公室，但是他們二位性格中的沈穩，使噪音無法干擾到他們。

並不是所有人都滿意我的英文翻譯，我記得有天院內的導覽員來到我們的辦公室，看起來有些困擾，導覽員解釋說有位美國觀眾問她「fict」這個字，那是我用來解釋中文「封地」的英文字，這字出現在解釋周朝禮器的銅製容器說明牌上。導覽員解釋給觀眾聽，觀眾頻頻搖頭無法接受，最後結束話題，是因為美國觀眾告訴導覽員說「英文沒有這個字」。為了讓導覽員減少受傷的感覺，我指給她看在我桌上英文字典中，「fict」出現的地方。

當要佈新展的時候，每個館員都會待到停止開放時間的傍晚以後。他們習慣打開大的玻璃展示櫃，因為負責庫房管理的技工可以取出裡面的文物。同樣地，



郎世寧（一六八八～一七六八），〈白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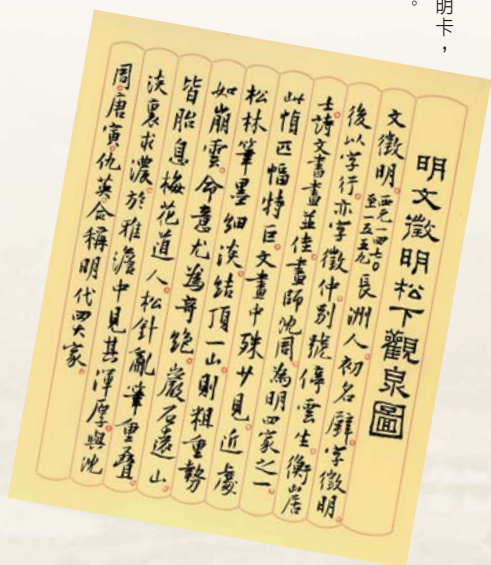
梁楷（活躍於十三世紀初），〈仙人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在放書畫藏品前，館員會清理展示櫃玻璃表面與內部，並且放妥說明牌。而當佈展完成後，走過陳列室且讚嘆最後完成的樣子，對我來說是個刺激的經驗。

在中國，書法令人崇敬，爲了讓觀眾更容易瞭解筆法，書卷常常被展示出來，比繪畫擺放的位置還要低。本國觀眾總是花比較多時間在研究書法，而外國觀眾比較著迷於繪畫。我常常會覺得當本國觀眾經過陳列室時，會固定去看玻璃展示櫃，而外國觀眾就會去看牆上的展示。我猜想博物館或許可以流露出這種文化欣賞的差異。也有許多觀眾會談論那手寫的優美中文說明牌。

有時辦公室內會比較輕鬆，在佈展結束時，我們會比較放鬆還幽默地開玩笑，例如有次我們在看郎世寧畫的那隻白猿猴，江兆申就轉身跟傅申說：「誰有著又高又細長的身體啊？」然後看著傅申咧嘴咯咯地笑了一會兒，接著又安靜地說：「這些畫卷可能都是傅申的肖像吧。」尤有甚

早期的書畫展覽說明卡，  
此件為江兆申筆蹟。



者，江兆申指著梁楷著名的畫作，一個胖的穿著灰袍的仙人，說就像蔣院長復聰先生一樣。

通常春、秋時候的天氣比較好，書畫處的這四隻就會出去野餐，坐在環著博物院有遮蔭地方的花園內。江兆申時常以他一貫的風趣以及說故事的本領，逗得大家呵呵大笑。江兆申的玩笑通常都開在傅申那傳奇的愛好上頭。他與傅先生就像彼此理想的練習對手，我特別喜歡他們自然真切的對答。

我論文的一部份，就是我在翻譯的《墨緣彙觀》，這是安

岐所編的書畫目錄，我回憶當我問江兆申一些書中的片段時，他沒有任何遲疑，便清楚準確地解釋給我聽。此外他還說他十分樂意與我一起討論書錄，只要我們有空的話，也許談個半小時，或是在吃完午餐後。正如他所言，江兆申有耐心地引導我進入安岐的書錄世界，我開始有些敬畏這位聰明的老師。一九六九年我討論《墨緣彙觀》的論文序言，有幾頁被收錄在慶祝蔣復聰先生七十大壽的論文集內，這對我而言是一項殊榮。

蔣先生同時也有一位英文秘書，是王秋土先生，常常待在書畫處。因為中文是我們辦公室共通的语言，王秋土先生常跟我用中文交談，雖然理查 (Richard)——王秋土先生的英文名字——常常跟我討論他替蔣先生準備好的英文信。這些信件內容行文優雅，只需要少許編輯。不過我從未聽過理查開口說過英文，直到有一次我們一起去台北機場，接一位受邀來故宮參加研討會的學

者，那位學者不會說中文，理查因此用文雅流暢的英文與他交談，一如他書寫的信件般。——我在故宮所見所聞，這裡真是人才濟濟。

#### 四、

當新的博物院對外開放後，蔣先生非常希望可以把院藏的東西介紹出去，其一就是刊登資訊在《故宮通訊》上面。那先生負責這份英文雙月刊物，我則協助編輯文章，讓刊物提供讀者關於院藏文物的簡短討論，以及與其他收藏的關聯。精美的圖片是《故宮通訊》內容的特色。

有時我會幫那先生翻譯信件，我已經很習慣翻譯他那又小又工整的書法字，以及他想要表達的正確意思。到現在，我仍然清楚地記得他堅毅不撓的研究精神，那先生永遠都在忙於一項或兩項的研究計畫，他收集早期的中文古籍或是從院藏中做研究，他樂於談故宮的歷史，而我也熱衷聆聽，我們曾談過一九二五年

故宮開院時候的刺激景象。身為一個年輕的館員，當時他站在入口處的高凳子上大聲告訴觀眾參觀的方向，該去哪一個陳列室。那先生這多采多姿的一生，都對故宮保持同樣的熱忱。

許多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史的學者，都會到臺灣的故宮做過研究。這些學者對於不同的藏品都有不同的回應，同樣地，他們也會與研究員討論，這些都十分有意義。因為館員已經習慣給外國訪客中文名字，或是使用中文發音來念每個字，因此我有時候會搞混究竟是哪位外國訪客，得等到他們到故宮之後才清楚。例如有如一次如慣例般以新奇又熱切的心情迎接一位叫做「Mei yuan mo chih」先生的來訪，我自己默唸了數次，但因為沒有見到中文字，我無法判別訪客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因此懷著急切地心等待這個人走進服務台，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梅原末治 Umehara Sueji（一八九三～一九八二）先生，他是日本一位研究藝術史

的有名學者，也撰寫許多中國藝術與人類學的著作，他的著作都列在世界上所有學者的參考書目中。

梅原教授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端詳文物的時候就會將它們湊近眼睛看。為了能夠更清楚看見細節，他會拿出第二副眼鏡放在前頭，專心地凝視。梅原教授不畏艱難以他自己的角度，判斷那些相關形式的研究問題，還有替中國器物斷代，他總是條理分明並且切中關鍵。

蔣復璁先生越來越有興趣讓更多人知道故宮的藏品，有一部份的教育計畫就是開始對大眾的演講，大部分的演講都是使用中文，少有其他語言的使用。我記得李濟先生（一八九六～一九七九）是第一位以英文演講的學者。李先生曾在二十世紀初期，在安陽參與商代王陵挖掘工作，出土文物標著中國重大科學考古發現。他也是南港中研院史語所的研究員。史語所有許多商代的出土文物，在他的演講中談

到安陽考古的重要意義。我仍然可以回想起他滔滔不絕的口才以及我所得到的東西，我再一次感到幸運，能夠聽見這位著名學者的演講。

有時我在故宮的陳列室帶一些外國團體，給他們一些一般程度的英文導覽。參加這些團體的大多是國外駐華代表的夫人，夫人們對於中國藝術十分熱衷，能夠和她們分享我從研究員身上習得的知識，是我的榮幸。因此我與一些外國的駐華僑民變得較為熟識，不過我開始有些擔心成爲一個有名的演講者，因為當我去美國在台協會延長簽證的時候，負責的人看著我的護照一會兒後說：「Lawton? 噢對，就是那位老對女人們演講的人。」

## 五、

一九六七年秋，佛利爾美術館館長—璞博博士（Dr. John A. Pope 一九〇六～一九八二）來參訪故宮，他是著名的中國陶瓷專家，他希望能研究一些故宮有名

的元明時期青花瓷，我是璞博博士參訪時的隨行口譯，他對於中國陶瓷的形制與年代非常熟稔，令我印象深刻。當他小心翼翼地拿著不同的瓷器，也反映他豐富的人生閱歷，如同他對於他的學問，總是鉅細靡遺地寫下例子與說明註解。

離台前，璞博博士告訴我他在找新的研究員，最後補充說，他希望我考慮去他那裡工作。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實在太驚訝了，以致於說不出任何話，只說我需要想一想再回覆。璞博博士沒有因為我的猶豫有任何不滿，他只說他會等我。

我的兩難處在於，能在故宮工作非常開心，每天所得所學甚多，並且明白自己仍有許多不足。另一方面，我知道佛利爾美術館的中國館藏品質很高，並且佛利爾的研究員可以同時關注展覽與研究，因此我能有時間繼續我的研究計畫。璞博博士也提醒我，佛利爾美術館與國家圖書館很近，那邊的中文藏書與資料豐

富。思考數日後，我寫信給馬可·羅越 (Max Loehn) 教授，且告訴他我無法做決定的事情。我同樣提到我的顧慮，不知是否可接下大任，幾日後我收到羅越教授的的回信，信中他用慣常的語氣與我討論我的困擾，最後他說：「若我們都等到我們已準備好接受新工作，那就沒有人可以工作了。」幾年以後的經歷告訴我，這句話實在是非常中肯的建議。

蔣先生、那先生與江兆申，同樣地理解我接受佛利爾美術館職務的決定，蔣先生安排我以及其他人，在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於陽明山的住所，舉行我的歡送會。蔣夫人與我們談話時總是十分高雅，當我們談論在故宮的工作時，她常常聚精會神地聆聽並且給予回應，可見她對於中國藝術的每個層面都十分有興趣。她的仁慈與慷慨永存在我心裡。

## 六、

故宮有我太多難以割捨的回憶，那裡有許多朋友，要一一追

述並不容易，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在台灣所得到的，對於我日後的研究生涯以及館長工作的幫助難以估計。但除了博物館經驗，我同時也學到深遠的中國文化精神與中國式的文人交誼。有些故宮的朋友已經退休，甚至令人遺憾的是有些已經去世，但他們會給予我的，我始終心存感激。我誠心地認為，能夠認識他們，真是此生難得的機遇！

(羅單，佛利爾美術館榮譽退休館長)

### 參考書目

1. 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臺灣：中華叢書委員會，一九五七。
2. 那志良，《故宮四十年》，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
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故宮書畫錄》，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五，第四期。
4. 羅單，〈安岐之墨緣叢觀〉，《慶祝蔣復璁先生七十歲論文集故宮季刊特刊第一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六九，頁十三～三五。
5. Thomas Lawton, "Na Chih-liang 那志良", *Obituary (訃告)*, *Artibus Asiae*, vol.1, 58, nos.3/4 (1998), pp. 337-338.
6. Thomas Lawton, "Chiang Chao-shen 江兆申", *Obituary (訃告)*, *Artibus Asiae*, vol.1, 56, nos.3/4 (1996), pp. 373-374.